

试论匈牙利民族的基督教化及影响

摘要：中世纪匈牙利的主体民族马扎尔人是具有乌拉尔语系背景的一支游牧民族，最初信奉原始宗教，公元9世纪末迁至潘诺尼亚平原。他们与本地原有居民相交融，逐渐形成匈牙利民族。在国际局势和民族发展需要等因素的影响下，匈牙利民族皈依了基督教。匈牙利民族的基督教化，不仅为其建立封建国家清除了障碍，加快了文明化进程；也为其借机融入欧洲文明圈，乃至形成新的欧亚文明接触带，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中世纪 马扎尔人 匈牙利民族 基督教化

中世纪匈牙利人的主体是马扎尔人,属于乌拉尔语系芬-乌戈尔语族(FinnoUgrians)中的一支。公元5世纪起从祖居地卡玛河(Kama)和别拉雅河(BelayaRiver)与乌拉尔山脉环抱地带向西迁移,公元9世纪末迁至中欧潘诺尼亚平原(Pannonian Plain),逐渐脱离哈扎尔汗国(Khazars)的控制,建立起独立王朝。马扎尔人早期流行原始信仰,部落内盛行图腾崇拜。公元9世纪末至11世纪期间皈依了基督教,成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重要力量之一。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马扎尔人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其族群的起源、迁徙过程以及语言问题,对其宗教信仰的转变并无详细论述。西方学者虽有关注马扎尔人的宗教信仰,但相关研究多着眼于其皈依基督教的过程。本文在考察马扎尔人原始宗教信仰后,着重分析其皈依基督教的原因及影响。

一、马扎尔人的缘起及其宗教信仰

关于匈牙利人的主体马扎尔人在定居之前的历史及其族源,学术界观点不一。一段时间内中西学者曾认为马扎尔人与匈奴人有关,原因是匈奴之前曾大

肆入侵欧洲，加之中国汉字“匈”字也易让人望文生义。随着考古资料的发掘证明，公元455年以阿提拉(Attila)为首的匈奴人被日耳曼人打败后，只有极少部分人留在潘诺尼亚平原且与当地民众融合，所以马扎尔人是匈奴人的观点被否定。美籍华裔学者朱学渊认为马扎尔人是从中国东北出走的靺鞨。也有人认为马扎尔人属于突厥人，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公元10世纪拜占庭的史学家、皇帝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 Porphyrogenitus)。由于马扎尔人早期迁移过程中，基本生活在突厥人所管地区，所以9世纪末和10世纪的文献资料中将其称为突厥人。根据语言学研究的成果，马扎尔人并非纯粹的突厥人，而是属于原亚欧大陆分界处乌拉尔山附近的乌拉尔语系芬-乌戈尔语族中的一支。关于其族源，目前学界比较普遍认为“匈牙利民族最早源于伏尔加河，在卡玛河和别拉雅河与乌拉尔山脉环抱的地带”。

随着游牧社会经济的发展，马扎尔人从公元5世纪开始逐渐脱离芬-乌戈尔族向外迁移，持续了近四个世纪。他们先由祖居地移至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后经过亚速海沼泽地继续向西移动，大约9世纪初，到达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莱韦迪亚(Levedia)及第聂伯河和多瑙河下游的埃泰克兹(Etelkoz)一带。埃泰克兹时期的马扎尔人主要由7个部落组成，即涅克(Nekis)、麦扎尔(Megeris)、居特焦尔马特(Kourtougermatos)、陶尔扬(Tarianos)、耶诺(Genach)、凯尔(Kari)和凯西(Kasi)。其中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麦扎尔部落，转音为Magyar(马扎尔)，日后成为全族人的统称。当时马扎尔人隶属于哈扎尔汗国。9世纪末，强盛起来的马扎尔部落逐渐摆脱哈扎尔汗国的控制，7个部落在埃泰克兹“歃血为盟”，共同遵循“异教徒习惯”，还商定了彼此遵守的5个原则：国王般的荣誉将由部落联盟的首领阿尔莫什(Almos,约850—895年在位)的后裔们所拥有；统治者

所得应该在联盟中分配；领袖及其后裔在联盟中永远占有一席之地；煽动违背领袖或制造冲突的人应当被处死；试图破坏原则的人应受到永恒的诅咒。阿尔莫什之子阿尔帕德(Arpad,889-907年在位)被推举为大公,由此开始了匈牙利史上的阿尔帕德王朝。阿尔帕德带领下的马扎尔人因受突厥系佩切涅格人(Pechenges)的攻击,于896年迁入潘诺尼亚平原定居,这一年在匈牙利史上被称为“定居年”。定居潘诺尼亚平原的马扎尔人继续过着游牧生活,并不断对外进行冒险战争。他们侵袭拜占庭、意大利、巴伐利亚、大摩拉维亚、萨克森等地,但最终于955年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Otto I,912-973)打败,彻底结束了冒险战争。此时的马扎尔人面临着命运的抉择:要么继续传统的游牧生活,要么效仿比其发达的西欧人。最后他们审时度势选择后者,开始了从游牧向农耕的过渡,以封建制取代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制,也逐渐以基督教取代原始宗教信仰。

马扎尔人早期信仰可归入芬-乌戈尔语族的神话系统,具有原始宗教信仰特征。他们从5世纪外迁后,就与祖居地的文化根源分离,迁入中欧后,其四周被许多异族环绕。负责马扎尔人部落联盟的精神指引是祭司“凯代”(Kende),部落联盟中流行的宇宙起源神话,接近于北亚和中亚部族。马扎尔人接受基督教之前,还经历了所谓“前基督教时期”,其所信奉的“伊斯特恩(Isten)”,似乎是当时部落民众对至高天神的称呼,含义接近于“父神”或“天神”。在阿尔帕德时期,图腾崇拜也十分流行,他们信仰图腾神禽图鲁尔(turul),以及狮鹫、狼和鹿。在萨满教的传说中,图鲁尔栖息在连接大地和天空的树上,该图腾意味着统治的长久。族群中还盛行宇宙树的观念,传说这种树有7个枝干,连接着天宇、地界和生命之泉,又有所谓的七圣母,这与马扎尔人的7个氏族部落

相对应。马扎尔人奉行原始信仰，表明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及文明程度不高，不能指引他们向更高级的社会发展，转变信仰变得迫切。

二、促使匈牙利民族皈依基督教的诸多因素

匈牙利民族在定居多瑙河中游后，像日耳曼人以及斯拉夫民族一样皈依了基督教。他们皈依基督教是融入欧洲文明的关键一步，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漫长的，并非一蹴而就，且呈阶段性，即从个别氏族部落的皈依到国王自上而下推行基督教。皈依基督教是匈牙利民族的历史性抉择，基督教化的实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匈牙利民族皈依基督教深受拜占庭及其教会的影响。匈牙利部落初次出现于基督教文献中，是公元 837 年在多瑙河入海口与拜占庭人相遇的一段记载，这时已被称为马扎尔人。此后，匈牙利民族和拜占庭人交往的记载增多。拜占庭帝国解决危机除了用军事和外交方式外，对敌国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也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传教对象中包括匈牙利人。所以，当匈牙利人还处于氏族部落联盟阶段时就深受拜占庭教会的影响。据记载，拜占庭传教士加伯莱(Gabriel)在 927 年携带皇帝的书信拜见匈牙利的部落酋长，希望得到酋长的支持，允许其在民众中传教，与此同时还试图说服酋长再度出兵攻打佩切涅格人。酋长拒绝了出兵的事情，但却同意了传教。此外部落联盟中一些酋长和贵族也访问君士坦丁堡，其中包括大酋长布尔克斯(Bulcsu),阿尔帕德的长孙特迈克斯(Termacs)。其中大酋长布尔克斯在 948 年接受了基督教。952 年，又有其他首领到君士坦丁堡接受洗礼，拜占庭的大教长赛奥菲拉克特(Theophylact)任命修道士海洛塞乌斯(Hierotheus)为“匈牙利主教”，并随同他们到匈牙利人中传教。957 年，南喀尔巴阡山脉定居的部落酋长贵于拉(Gyula)接受了基督教，君士坦丁堡成为其教父。君士坦丁堡所写的著作中记

录了各个民族参观拜占庭的名单，其中包括了在拜占庭接受洗礼的匈牙利人首领，可见拜占庭的传教活动对匈牙利人皈依基督教的影响。拜占庭帝国除了派遣传教士外，其传统的外交策略还包括借助一方力量对抗敌人，而且也常用特殊的恩惠、头衔和礼物来满足“野蛮人”统治者的需求。如18世纪在匈牙利发掘的“君士坦丁·蒙诺马毫斯皇冠”就是表明匈牙

利国王与拜占庭之间关系的重要文物。该皇冠从外形看是典型的拜占庭式皇冠，其装饰物包括7块黄金珐琅图画，描绘了皇帝君士坦丁·蒙诺马毫斯(Constantine IX Monomachos)和共同执掌皇权的两位皇后邹伊(Zoe)和奥赛多拉(Theodora)，以及使徒彼得(Apostle Peter)和安德烈(Apostle Andrew)。匈牙利史学家推测，这幅图可能是拜占庭君主的礼物，赠予属国君主匈牙利国王安德烈(Andrew, 1046—1060年在位)及其妻子的，并推测这时安德烈国王可能已经承认拜占庭帝国为其宗主国。12世纪后，拜占庭和匈牙利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体现在盖萨二世(Géza II)的儿子贝拉三世(Béla III, 1172—1196年在位)的宗教政策。贝拉曾作为人质在拜占庭生活近十年，长期接受基督教熏陶，1172年回到匈牙利成为匈牙利国王。继位初年与拜占庭保持着的友好关系，并承认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Komnen)是其教父。虽然贝拉去世后匈牙利与拜占庭的亲密关系结束，但几个世纪中拜占庭与匈牙利人的交往和联系，显然对后者皈依基督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匈牙利大公和国王的牵头作用也是推动匈牙利民族实现基督教化的重要原因。马扎尔人氏族部落联盟定居潘诺尼亚平原后，已有部分部落在首领的领导下接受了基督教，如蒂萨河(Tisa)以东丘陵地区的阿杰托尼(Ajtony)部落，在多瑙河重镇维丁接受了拜占庭教会的洗礼，皈依了基督教，并在首府马罗斯

瓦尔建立修道院，聘请拜占庭修道士对其进行管理。还有部分人员在战争掠夺过程中也接触到基督教，如 926 年匈牙利士兵出现在圣本尼迪克特修道院 (St.Benedict)。洗劫过后，他们邀请了修道院中教士海里巴尔(Heribald)随他们继续征服。所以至阿尔帕德大公时期，已有不少氏族部落接受了基督教，这为基督教化奠定了基础。匈牙利王国的奠基者盖萨大公(Geza,970—997 年在位)时期，氏族部落已不具有完整形式，他意识到匈牙利民族要想在欧洲生存就必须与周围国家友好相处。当时其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神圣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尤其是人口更多、距离匈牙利更近的神圣罗马帝国。迫于生存，盖萨大公皈依了基督教，还派代表参加了 973 年在奎德林堡(Quedinburg)举行的宗教会议，这就意味着匈牙利民族向神圣罗马帝国的传教士打开了大门，同时也向周围欲入侵潘诺尼亚平原者隐晦地传达了信息：如果他们想征服匈牙利就会招致神圣罗马帝国的不满。这一信号在一定程度上为刚定居于潘诺尼亚平原的匈牙利民族提供了保护。盖萨大公的皈依打开了匈牙利人与西方交往的门户，尽管这位大公在推行基督教时采取了很多血腥政策。997 年，盖萨大公的儿子伊斯特万一世(Istvan I,997—1038 年在位)继位，其父安排他娶了信仰基督教的巴伐利亚公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Henry II)的妹妹吉塞拉(Gisela)。匈牙利史学家奥曼(Homan)曾对两人的婚姻评价道：“圣斯蒂芬与巴伐利亚公主吉塞拉的婚姻是政治上的一个巨大成功……出于政治原因盖萨大公寻求与巴伐利亚建立联系……随着匈牙利新时代的开始，不再有像盖萨大公那样的异教徒和肤浅的基督教徒存在。”可见伊斯特万一世皈依基督教深受吉塞拉的影响。公元 1000 年，伊斯特万接受了罗马教皇希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的加冕，称为圣斯蒂芬一世，更加明确了匈牙利教会隶属于基督教。在其皈依后，他采取

了强制和说服两种方式推行基督教，如镇压国内企图反叛的贵族，打击异教徒；呼吁王室成员接受基督教；他还聘用许多拜占庭建筑师主持修建国内的教堂，在他统治时期，下令每 10 个村庄设立 1 个教堂，共建立了 2 个大主教区和 8 个主教区，规定了神职人员的义务和权利。此外，神甫及州官还可命令各村村长：“除看守火种者外，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前去教堂”；教堂中“谈笑风生，干扰他人者”应逐出教堂，如该人年事不高，并系普通平民，应予鞭答并处以髡刑。为获得教会的支持，伊斯特万一世赐予教会大量财产，例如，维斯普雷姆(Veszprem)的教堂管理着周围 7 个村庄，其中包括村庄的人和财产，还有一个修道院则管理着 9 个村庄，包括两百多个家庭，在桑托(Szanto)的市集的收入以及在切佩尔(Csepel)岛附近的港口收入也归修道院所有。主教地位也被提升为社会的第一等级，教会在这一时期成为王室的重要支持力量，在整个匈牙利王室中弥漫着基督教的气息，甚至王室成员以是否拥有教名作为衡量教养的标准。据记载，至公元 12 世纪，80% 的女性都拥有基督教名。在伊斯特万一世留下来的“遗嘱”中也可看出，他本人也认为皈依基督教是其在位期间最伟大的成就，他明确将国家的未来与是否信仰基督教联系在一起，并建议之后的继任者能够继续信仰基督教。后来的国王也遵奉了他的宗教政策，如拉斯洛一世(Laszlo I,1077—1095 年在位)。他对国内残余的异教徒处以重刑，并下令修复教堂，对星期日不上教堂做礼拜的人“处以鞭刑，以资挽救”，如有人按照异教徒习惯在井边祭神、祭树、祭泉水、祭石头等，罚牛一头。正是从拉斯洛一世开始，匈牙利基督教和原始信仰之间的冲突基本结束，基督教在匈牙利民族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可见，匈牙利皈依基督教与大公和国王自上而

下的强制推行密不可分，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欧的教权与皇权之间的互动有相似之处。

第三，匈牙利民族接受基督教，既与其原始宗教的接纳程度有关，同时也与迁入地潘诺尼亚平原的已有信仰有关。马扎尔人崇拜太阳，也有资料显示其崇拜火。他们相信死后灵魂不朽，这是典型的万物有灵论，这种原始宗教对基督教的接纳度很高。“不管新的宗教来自何方，不习惯于对事实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头脑，都几乎不会否定这种超自然物。”当其原始信仰已经无法适应和满足面对新环境的发展需求时，作为一神教代表的基督教则在这一时期充满了活力和吸引力，尤其是周围国家的氛围和拜占庭传教士的活动，基督教替代其原始信仰成为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匈牙利民族皈依基督教也与潘诺尼亚平原原有居民流行基督教有关。早在公元2世纪，潘诺尼亚平原就有很多基督徒，大约到公元6世纪中叶，黑海北岸到处能见到基督徒。后来斯拉夫传教士麦瑟迪乌斯(Methodius)和希利尔(Cyril)兄弟成为潘诺尼亚地区的大主教和教皇在该地区的代表，他们的传教活动主要在潘诺尼亚的摩拉维亚进行。虽然匈牙利人摧毁了摩拉维亚，但基督教留存下来。后来匈牙利的主教海洛塞乌斯(Hicrotheus)传教的范围大致相当于麦瑟迪乌斯和希利尔兄弟传教的地区，这一地区已然深受斯拉夫化基督教的影响，为后来者匈牙利民族皈依基督教奠定基础。这一影响虽无法做定量分析，但对刚从游牧生活转为定居农耕的匈牙利民族来说，定居地的原有信仰和生活方式无疑对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四，匈牙利民族皈依基督教是本民族发展需要和周围国家共同影响的结果。在阿尔帕德大公带领下的匈牙利人定居潘诺尼亚平原后，氏族部落仍以游牧生活为主，且积极从事对外冒险战争。定居之后他们入侵意大利、巴伐利亚、

德意志的萨克逊地区等，对西欧和南欧多地侵袭，以致欧洲人以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时代再次出现，且没有尽头。公元10世纪中叶，随着神圣罗马帝国日益强大，955年在奥格斯堡附近奥托一世打败了匈牙利，彻底结束了匈牙利民族的冒险战争。战争的失败使匈牙利民族面临两种选择(或继续对外战争步匈奴人和阿瓦尔人(Avars)的后尘，或效仿欧洲人文化)，最终他们选择了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即从游牧转为农耕，从信仰原始宗教转为皈依基督教。这看似简单的转变却是匈牙利民族为求生存做出的历史性抉择。在皈依基督教的过程中，匈牙利内部社会结构也发生变化，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联盟逐渐转变为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州治制度”。这需要强大的封建王权来应对这种变化，而全族皈依基督教有利于促进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巩固。皈依基督教也与其身处基督教势力的大环境有关。潘诺尼亚平原的人类活动有悠久历史，因其地理位置而成为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曾在其居住或停留的民族很多，如罗马人、匈奴人、阿瓦尔人、东西斯拉夫人等。尽管没有哪个民族像马扎尔人一样在这里建立政权，但雁过留声，这些民族的文化痕迹在潘诺尼亚平原会多多少少存在，无论生活方式抑或宗教信仰都会对后来者马扎尔人产生影响。如匈牙利语中的“十字架(kereszt)”就是源于古斯拉夫语词根，表示其住处的“帐篷(sátor)”也取自斯拉夫语，这表明斯拉夫式基督教在这里留有影响。周围国家的宗教信仰和政策趋向也促使匈牙利人“随大流”而皈依基督教。如当时匈牙利的宗主国哈扎尔汗国对其所属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不强迫属国跟随自己信仰犹太教；摩拉维亚在圣希利尔和麦瑟迪乌斯兄弟的影响下进入基督教世界；保加利亚国王也带领全国皈依了基督教。这种周围国家皈依基督教的趋势，使得匈牙利民族时刻感受基督教的影响，最后也迈向了皈依基督教的道路。总之，匈牙

利民族皈依基督教，是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选择，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匈牙利民族基督教化的影响分析

中世纪匈牙利民族皈依基督教，对匈牙利自身发展，对中世纪欧洲格局以及欧亚文明圈的形成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匈牙利民族基督教化最直接的影响，在于加快了其文明化进程。皈依基督教后，匈牙利民族常与欧洲国家交往，在圣斯蒂芬“训诫”中也强调了接纳和容忍外来群体的重要性。欧洲国家的商人、工匠、农牧民等来此定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文化艺术形式及成果，如民间艺术形式刺绣的出现，就可以追溯到圣斯蒂芬的妻子吉塞拉，她为刺绣的传播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建筑风格尤其是教会建筑以及音乐形式都深受西方世界的影响。从圣斯蒂芬开始，匈牙利民族也派遣神学院的学生到欧洲学习，并为其在罗马建立了宿舍。匈牙利民族在皈依基督教的过程中，文化也逐步基督教化，异教的历史文物被毁，教堂和教会在国内建立，如盖萨大公在中世纪后期最著名的城镇塞克什白堡(Székesfehérvár)建立了一座教堂。圣斯蒂芬时代，教会的建立出现了两个高峰期，第一个时间段为1001年至1002年，维斯普雷姆(Veszprém)、杰尔(Győr)、佩奇(Pécs)、埃格尔(Eger)、查纳德(Csanád)(今天罗马尼亚的切纳德)以及瓦茨(Vác)建立了教会；第二个时期为1009年，建立了以阿尔巴尤利亚(Gyulafehérvár)为中心的特兰西瓦尼亚主教区。比哈尔(Bihar)主教区的建立也可以追溯到圣斯蒂芬时期，尽管之后被拉斯洛一世转移到今天的罗马尼亚的拉迪亚(Nagyvárad)。据统计，圣斯蒂芬时期，建立了10个主教辖区。他还在佩奇瓦劳德(Pécsvarad)、蒂豪尼(Tihany)、绍莫吉堡(Somogyvár)等地建立了

一系列修道院。此外，在他的国王法令中要求每 10 个村庄建立 1 个公共教堂，给牧师提供 2 所房子和动物，由国王提供法衣，主教提供书籍等。尽管教区繁盛的趋势被异教徒起义所阻断，但基督教化的进程依旧在民族内推进，到拉斯洛一世时，明确规定要修复城镇和乡村教堂，重建受损或被毁坏的主教区是民众的责任，即使村民要搬迁也下令禁止遗弃教堂。不仅如此，国王的事迹和圣者传记也用教会通用语言——拉丁语记录，如斯蒂芬一世颁布了很多扶持基督教的法令，均用拉丁文书写，促使拉丁文在匈牙利普及，现代匈牙利语也是由拉丁字母拼写而成。皈依基督教使民众有了坚定的信仰，强化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推动了匈牙利民族的文明化进程，为近现代匈牙利民族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二，匈牙利民族皈依基督教，为统治者打压异教徒提供了合理理由，为封建王朝的建立铺平道路。定居潘诺尼亚时，马扎尔人还处于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联盟阶段，部落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各部落的首长组成。随着农耕经济发展和部落制度的瓦解，大公和国王自上而下推行基督教，对国内异教徒施以重刑，打击不愿接受新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旧氏族贵族，如阿杰托尼(虽已皈依基督教，但仍尊奉异教信仰并娶有 7 个妻子)，异教在国内消失。取代异教信仰的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将国王提升为民众信仰的捍卫者和“基督子民的牧师”，封建王权集中于国王手中。匈牙利第一任国王伊斯特万一世依此进行改革，打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联盟，建立了以地域为基础、以城堡为中心的“州治制度”，逐渐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他还继续推行基督教，在国内设立主教区，并规定凡皈依基督教的农牧民每年将收成的 1/10 上交给教会，这是模仿实施西欧教会的“什一税”。教会宣扬封建等级制是上帝的意志，

对试图造反和违抗教义和人施以惩罚。这些措施后世国王也加以效仿，加快了封建政治制度在王国的建立和发展。

第三，匈牙利民族皈依基督教，民族实力增强，在面对周围大国威胁时，能根据自身利益调整对外交往策略，拥有了更多话语权。匈牙利民族在皈依基督教前，常被强国利用，曾作为拜占庭帝国的雇佣军打败了保加利亚国王西蒙一世(Simeon,893—927年在位)亲率的大军，匈牙利俘获了其军队一半的士兵，并将他们作为奴隶出售至拜占庭帝国。而到后来，拜占庭皇帝利奥六世(Leo VI,886—912年在位)却与西蒙一世签订停战协议，将匈牙利出卖，致使其反遭保加利亚联合佩切涅格人的报复。盖萨大公时期，匈牙利民族则深受神圣罗马帝国和拜占庭的侵扰，两国都声称拥有对匈牙利的主权。为求民族生存，盖萨大公的对外政策发生转变，即以积极融入基督教世界但不屈从于基督教国家为宗旨，所以皈依基督教为匈牙利民族提供了除战争之外的另一种对外交往方式，如前文所述，盖萨大公派代表参加了973年在奎德林堡举行的宗教会议。这场会议对匈牙利民族的意义重大，首先，神圣罗马帝国不再将匈牙利民族视为敌人，而是将其视为打击对当时神圣罗马帝国有威胁的国家如意大利和波兰的重要力量；其次，匈牙利也向神圣罗马帝国的传教士打开了大门，他们不仅将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带到匈牙利，还在一定程度上为本民族的民众提供了保护，免受巴伐利亚及其盟友的伤害，因为他们认为杀害异教徒是合法的，从而避免成为基督教国家发动打击异教徒的“圣战”的对象。至圣斯蒂芬统治时期，基督教正式成为匈牙利的国教，国家实力增强，与许多欧洲国家从之前的敌对状态转而变成盟友，例如巴伐利亚。德国历史学家威廉·冯·吉塞布雷赫特(Wilhelm Von Giesebrecht)曾评价圣斯蒂芬的策略：“基督教从根本上提高了人民生活

水平，取代了旧的部落制，创建了一个新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匈牙利发展成一个主权国家，在西方世界享有充分的权利。”皈依基督教使匈牙利民族不再是好战的游牧民族，也不再充当周围大国的“前哨和辅助部队”，与其关系从“臣属”变为“伙伴”，匈牙利民族也成为中欧历史上一支重要力量。

第四，匈牙利民族选择基督教，使其获得进入中世纪欧洲文明圈的机会，成为欧洲中部一支重要的基督教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欧亚文明接触带格局的奠定。对于游牧民族而言，迁徙常会带来新的机遇，看似被动迁徙可能促成主动扩张，所以匈牙利民族的到来给拜占庭造成了威胁。对文化极度自信的拜占庭帝国而言，解除威胁最好的方式是使其臣服自己，阻断其继续向西扩张，转换成拜占庭帝国的保护者。由于拜占庭和罗马天主教常在中东欧和巴尔干半岛争夺领地，这些地区的宗教信仰也深受两者影响。在经历拜占庭帝国的打压后，匈牙利民族意识到想要在欧洲生存，就必须“合群”，即与西方世界交好，否则就会像佩切涅格人、阿瓦尔人、库蛮人(Cumans)、阿兰人(Alans)和哈扎尔人那样消失。所以盖萨大公选择接受罗马教廷，派遣使者前去神圣罗马皇帝住处，请求派遣神职人员来匈牙利传授基督教，接受了帕绍(Passau)大主教皮利格林(Piligrim)的传教。他还积极促成其子斯蒂芬与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吉塞尔公主的婚事，11世纪的编年史学家维波(Wipo)和赫里曼努斯(Herimannus)认为吉塞尔“使她的丈夫斯蒂芬皈依基督教”，并且通过斯蒂芬使整个匈牙利民族都发生了改变。“当时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势力划分大致以蒂萨河一线为界，界线以东属于东正教势力范围，以西为罗马天主教，而匈牙利民族恰好处于河西岸。”宗教上选择天主教意味着匈牙利在政治上倾向了西欧。这种选择也符合匈牙利所处的位置。匈牙利民族信仰天主教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三世

(Otto III)将其视为神圣罗马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教皇希尔维斯特也将匈牙利视为“前哨”，认为它的存在有助于将教会势力扩展至东欧，还能破坏潜在的南北斯拉夫统一趋势，并在某种程度上阻止拜占庭帝国向北扩张以及东正教的传播。皈依基督教是匈牙利民族为生存融入西方世界的重要一环，也意味着匈牙利成为西方世界重要一员，承担了维护西欧基督教世界安全的责任。所以当西方后来面临蒙古人和奥斯曼帝国的入侵时，匈牙利成为西方世界的桥头堡，抵挡了亚洲游牧族向西方文明的入侵。匈牙利由此成了西方基督教世界抵挡来自东方亚洲内陆草原游牧民族以及伊斯兰世界扩张的“盾牌”，西方世界形象地将其称为“基督教之盾”，这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当今欧亚文明接触带的格局。

匈牙利民族定居潘诺尼亚平原后，于公元10世纪末以自上而下的模式开始皈依基督教。这时，还处于氏族部落时代的国王不仅是部落的军事首领，也充当着部落民众与神沟通的使者，具有一定的宗教决定权。匈牙利民族皈依基督教，实质是向着高级文明趋近，背后反映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农耕文明作为先进文明的代表，对游牧，半游牧民族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从匈牙利民族皈依基督教的过程来看，表明越是能适应农耕世界经济文化的，就越能维持他们的统治。通过皈依基督教，匈牙利民族成为原南俄草原游牧部族中走向文明的民族之一，先进的文化和一神教信仰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民族实力大为增强，扫清了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的障碍，为匈牙利人从松散的部落联盟发展成享有国际认可的主权国家奠定了基础。此外，匈牙利民族皈依基督教也使其融入欧洲文明圈，为新的欧亚文明接触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文作者唐笑笑，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